

之史”“贤人之史”“文人之史”“乱人之史”“小人之史”及“夷人之史”的观点。<sup>①</sup> 陈深《诸史品节·凡例》中言,“批评亦有三品”,即佳品、神品、妙品。<sup>②</sup> 明代史学批评实践为传统史学理论的凝练与升华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使史学理论呈现出缤纷色彩。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明代学者批评他人著述及被他人所批评,这种学术自觉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明代史著的繁荣发展,“不仅表现在史书编撰,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表现在实学精神下对史学经世之旨的强调和对史学严肃性的坚持”。<sup>③</sup> 并且,“在这不断地自我批评和自我克服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史家和史著,把明代史学的发展逐步推向了高潮,为明清之际出现的史学高峰,奠定了思想和学术的基础”。<sup>④</sup>

## 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评论,提出或褒或贬、或有褒有贬的论述。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但长期以来史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研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发现并提出史学批评的问题,需要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系统深入的研讨,对史学史有深厚的学识积累,还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反思精神,能够对史学批评的各种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思考。瞿林东先生从1964年起跟随白寿彝先生研读中国古代史学史,在教学科研实践中,从集中关注唐代史学扩展到整个中国古代史学,撰写了通贯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在长期读史过程中,深刻地察觉到中国史学史上这样一种现象,他强烈感受到这种现象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种动力,有必要认真加以梳理,于是他以“史学批评”的名目,开始对其进行了持续、系统研究。从1991年1月起,他在《文史知识》上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专栏,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并于1994年汇集为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此后二十年里,他始终致力于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问题的探索,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于2016年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瞿林东文集》(第二卷)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的几十篇文章,也都在不同层次上涉及史学批评问题。此外,瞿林东先生自2016年起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已经结题,并于近日推出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将会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瞿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新领域,同时史学批评的研究也推动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成为促进史学理论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史书占毕一》,第127页。

② 陈深《诸史品节·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2册,第3页。

③ 瞿林东主编《中国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252页。

④ 向燕南、张越、罗炳良《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学术增长点。

只要仔细阅读瞿先生有关史学批评问题的系列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揭示出史学批评这个范畴,并且由此视野展开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新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第一,有关史学批评的研究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批评这一现象,抓住了对史学发展中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关键点进行新的探索。于是,这样一部贯穿史学批评的史学史就成了在撰史理念与方法方面相互关联、继承、发展同时又存在不同意见论争的活生生的学术发展史。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学著作的先例,写出了名垂千古的史著《史记》,其书中就涉及了对《春秋》的高度评价。而司马迁的著作到了东汉时,史家班彪、班固父子就以他们的标准,批评了《史记》的缺陷。班彪指出,“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但他又批评说“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sup>①</sup>他的儿子班固也批评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sup>②</sup>但同时他们父子又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彪;“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而且,他们父子都有继承司马迁的事业继续编纂汉代史书的志向。《汉书》就是班固继承《史记》的体例完成的首部断代史著作,也可以将它看成在史学批评基础上对史书编纂的新开拓。

再仔细观察,这种史学批评现象确实贯穿在整个史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时期,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新时期。唐代产生了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全面总结、反思的著作——刘知幾的《史通》,反映了史学批评的新水平。宋代出现了欧阳修、宋祁主编的《新唐书》,它本身就是对五代后晋时期由刘昫主持编纂的《旧唐书》的一种否定,因为该书“芜杂不精”,从此《旧唐书》很少流传。但《新唐书》不久也遭到批评。宋代出现了吴缜《新唐书纠谬》这样的著作,针对《新唐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事实失实、事有可疑、自相违舛等二十类460条问题。而且,吴缜还提出了作史的三原则:事实、褒贬、文采等。不过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到了清代也引起了乾嘉学者的不同声音的批评,钱大昕批评它于地理、官制、小学等方面多有未达,而章学诚则基本上予以肯定。

总之,瞿林东先生的史学批评论著给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生动全貌,它赋予中国史学史一个新的生命力,这样史学史不再是单纯依赖历史文献而对于过去历史著作的僵死叙述,它“活”了起来,成为在史学批评中发展、律动的生气勃勃的史学发展现象。

第二,瞿林东先生关于史学批评问题的各种论述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史学史的诸多问题,并且形成了体系,初步构成了一个史学批评的范畴。他的系列文章揭示了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有关作史宗旨、史学功用、治史方法、史书编纂、史家修养等的一系列范畴。它们大多是在史学批评中酝酿和提出的,如良史,信史,直笔与曲笔,会通与断代,叙事,史论,论史,史法,史意,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体裁与体例,书法,事实、褒贬与文采等。他曾说过: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sup>③</sup>对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自从有了史学批评问题的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大大地活跃起来了。

第三,史学批评的研究使当代史学工作者与古代史家有了对话的条件,通过这种对话便能延续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史学批评中推动当代史学的发展。

① 范曄《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

② 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③ 参见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第91页。

历史学本身就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不断的对话。史学史不应是已经终结的史学的历史,当今的史学家在参与这场对话的过程中,不仅可以认识过去的史学现象,也可以起到推进当代史学发展的作用。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一命题本身就包括与古人对话的意思,其中也包括对史学批评者们的观点的质疑与批评。除了肯定他们正确的批评外,也指出他们的批评有欠公正或观点有局限之处。例如,瞿林东《关于章学诚史学批评的一点批评》一文就是这种对话的一篇代表作。他指出,章学诚因在史学理论领域有多方面“颇有新意”的论述,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者,章学诚的这种学术地位,并不会因其学说有逻辑上的瑕疵和思想上的局限而有所改变。但是,我们过去研读《文史通义》,比较关注它在某一具体方面的精辟论述并为之赞叹,而较少考察他在这一方面的论述同另一方面的论述是否协调,是否完全符合逻辑。例如他在这篇文章中,对章学诚所说“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的观点提出质疑。在章学诚看来,只有像司马迁、班固那样,继承“《春秋》家学”的史著才堪称“史学”。如此看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郑樵的《通志》等历史著作,还达不到“史学”的标准。瞿先生还认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自是一个积极的论断,多得后人赞许;但他在讨论历代史学发展时,多以“六经”为准则,史学演变的结果,都以回归“六经”为至善,这样一来,章学诚对于史学的许多论述就不能自觉地从发展、进步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而囿于“六经”的范围。

第四,史学批评问题的提出虽然是史学史的范畴,但其影响力不仅在于史学史,而是涉及整个史学研究。因为史学批评的问题涉及治史宗旨、编纂原则、编纂体例、治史方法、史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它所提出的原则、理念、方法,尽管是从古代史家论著中提出的问题,但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当前,为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必须在加强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上做更多的工作。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方面,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大力倡导采用具有中国文化传统、语言风格的概念和术语。当然,我们也要吸收西方史学的有益学术成果作为借鉴和参考,丰富史学的话语体系,但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的话语体系,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可以供我们利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上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所运用的一些概念、术语可以在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首先,史学批评范畴所产生的的概念、术语不是后人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外国学术概念的翻版,它们来自中国重要的史家、史著,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

如“良史”说,不仅出现早,而且延续到整个史学史。最初出自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sup>①</sup>此外,如班彪说司马迁《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sup>②</sup>班固说司马迁“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sup>③</sup>“史才、史学、史识”说出自刘知幾。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sup>④</sup>“史德”说出自章学诚。他说刘知幾所谓才、学、识“未足以尽其理”,“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sup>⑤</sup>“史法”和“史意”一对范畴也是来自章学诚。他说,人们把他比拟刘知幾,岂“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sup>⑥</sup>

①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注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2—663页。

② 范曄《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

③ 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④ 《旧唐书》卷106《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3页。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家书二》,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页。

“事实、褒贬、文采”说出自吴缜。他在《新唐书纠谬·序》中写道“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sup>①</sup>“会通”与“断代”优劣说出自郑樵。他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会通之义，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二是重“古今之变”。因此，郑樵推崇司马迁的《史记》，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sup>②</sup>对于这些概念、术语，瞿林东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一个个进行过专文的探讨，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史学批评的基本内容，后来又有更多的学者进一步进行过论述，这就为我们今天探讨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初步奠定了基础。今后，我们在研讨过程中或许会发现一些新的概念，但上述这些概念、术语无疑已经成为史学批评范畴的核心内容。

其次，这些史学批评者的概念、术语，思想内容深刻，语言简明精炼，体现了中国的语言风格。

古代史学批评者们所提出的概念、术语都是史家们经过深入思考提出的，对它们都有相应的论证。如刘知幾在提出他的“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的观点以后，进一步解释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矣。”<sup>③</sup>刘知幾这里的论述非常生动。他没有给史学、史才下一个简短的定义，但是，他的这种比喻能够让人理解史才和史学的内涵和它们的关系，因而多为后人所引用。章学诚在说明他的“史德”的观点时，撰写了《史德》一篇，更明确了“才、学、识”的涵义。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但章学诚指出，刘知幾所说的才、学、识，“未足以尽其理”，因此他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sup>④</sup>德、学、才、识的概念，到了近代被梁启超赋予了新的含义，早已被中国广大史学工作者所熟知和认可。

再次，通过对史学批评范畴的探索，有助于今天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古代史学家这些关于史学批评所运用的概念、术语，为我们今天研究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它们往往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若把它们作为当代史学的话语，还需要将其放在当代史学的语境下，注入当代科学的思想，赋予其理论内涵，克服其原有的局限性，这样才能使其为构建新时代史学的话语体系服务。

令人欣慰的是，近30年来，随着史学界对史学批评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对于史学批评范畴的研究。他们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史学批评范畴的内涵和史学批评的诸多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史学批评在史学史上各个时代的体现也进行了系统地挖掘，扩展了不同时代的内容，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1997年，瞿林东先生第一位博士生江涓的毕业论文就选择了对史学批评范畴问题的研究。此后，罗炳良、白云等学者持续就史学批评范畴问题进行了整体的探讨。罗炳良的文章阐述了史学批评的意义，说明了史学批评与一般史学评论的区别，指出“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高度概括和本质反映，就会形成规定史学批评的评价类型和学术规范，确定史学批评的统一标准和基本原则，这就是史学批评范畴”。<sup>⑤</sup>

史学批评范畴中的具体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刘开军从“史德”范畴的演进谈到史学批

①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② 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③ 《旧唐书》卷106《刘子玄传》，第3173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叶瑛校注本，第219页。

⑤ 罗炳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评的深化。他说,在史学批评范畴体系中,“史德”属于基本范畴。如刘勰提倡“素心”,李延寿则重视“良直”,刘知幾倡言“史识”,曾巩则论说“道德”,这样就形成了对于史家品质的一种规劝和评论。元末揭傒斯提出“心术”说,较之“良直”则更加抽象,具有学理上的意义。到清中期,章学诚正式提出“史德”说,并较系统地阐释了“史德”的内涵与修养方法。但是,必须指出,章学诚关于“史德”的观点仍然未能摆脱“名教”的羁绊,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局限。<sup>①</sup>舒习龙则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论及“史德”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sup>②</sup>

“史才”的范畴也受到当代学者的重视。谢贵安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一是指史家修史才能,二是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才、学、识、德),三是指史学人才。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sup>③</sup>

周文玖撰文论述了“直书”和“名教”两个范畴,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直书”和“名教”是两个重要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是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制约的,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传统史学的“史义”之中。<sup>④</sup>

朱露川论述了史学批评中的“良史”现象与“良史”论。她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良史”是人们常用的概念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从其由来和含义看,“良史”指优秀的史家和价值高的史书,有时也指史家的修史志向。不同时期人们的“良史”观带有时代特征。唐人的“良史”观,有丰富的内涵:一是修史活动中明确“良史”标准;二是指出“良史”难得;三是在学术辩难中凝练“良史”的特点。这反映了唐人鲜明的“良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良史”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sup>⑤</sup>

有的学者还谈到了史学批评范畴的其他问题,如白云还探讨了“文与质”“文与史”“曲与直”“创与循”“名与实”“简与烦”等问题,刘开军还探讨了“史权”问题。

当代学者对史学批评范畴的讨论内容是十分广泛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由此可见,自从20世纪90年代瞿林东先生开始论述史学批评问题并提出重视史学批评范畴的研究以来,对于史学批评范畴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史学工作者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当然,这里还需要梳理、选择、规范含义并形成一较完整的史学批评范畴的内容体系。随着这些概念、术语被深入地研究和运用,史学批评范畴的内涵也会逐渐明确,这无疑会对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体系发挥积极作用。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的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会一蹴而就,但它的构建不可能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同时也必然要从中国史学工作者耳熟能详并高度认可的话语中充分吸收营养和借鉴,这是毫无疑问的。

(责任编辑:杨艳秋)

(责任校对:廉敏)

① 刘开军《“史德”范畴的演进与史学批评的深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② 舒习龙、陈舒玉《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

③ 谢贵安《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周文玖《直书、名教和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⑤ 朱露川《浅论古代“良史”的三种含义》,《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6期;《试论唐人的史学批评与“良史”观念》,《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